

第 1 章 国际资本移动的宏观理论剖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和专家把研究的视角转向这一领域，他们力图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考察和研究，从理论上说明并指导跨国直接投资实践。迄今为止，他们的研究已结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本书首先要理清这些繁多的理论思路及体系，并加以评价和辨析，这对于我们吸收和借鉴国际上有关研究成果，指导并推动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国际经济学界关于跨国投资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国家为基本考察对象，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和探讨资本跨国移动可能给有关国家带来的利益，揭示不同国家允许和接受资本转移的原因。第二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探索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以及最终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各种决定因素。第三类是从企业组织演变的角度，通过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的利益追求、决策基础和行为方式的研究，说明跨国直接投资普遍发生的动因及一般规律。本书将循着从宏观到微观逐渐深入的研究轨迹，从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对跨国直接投资的有关理论学说进行归纳、总结和辨析。

国际经济活动最早是以国际贸易的形式出现，并且在很长时

期内一直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拥有独立版图范围和行政边界的主权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国民、厂商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自己国家的利益。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级利益主体和国际贸易活动的行为主体来考察，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因以及给国家带来的利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学说和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利益学说，指出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可以给国家带来利益。其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对古典比较利益学说进行了重大改进和创新，进一步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扩展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优势构成。他们认为，资本在国家间流动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利率水平差异所造成的，资本倾向于从利率水平较低的国家向利率水平较高的国家流动。但是，古典国际经济理论是在静态条件下分析问题的，他们的学说建立在一些假定条件上，其中主要假定是资本等生产要素不能跨国移动，只有产品可以在国家之间转移；各国的生产函数相对固定，从而成本的相对差别始终不变。这些假定使得比较利益学说在建立国际贸易理论上取得重大成果，但在解释战后广泛发展的跨国投资活动上却受到局限。俄林的理论也只是对跨国间接投资作出解释，但对于跨国直接投资现象则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释。

古典国际经济理论的限制性，促使人们创立新的理论学说以解释资本跨国移动现象的动因以及可能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了资本国际移动的宏观理论。本书首先就这一类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几种学说加以阐述和辨析。

1.1

国际资本移动给有关国家带来的利益

国际资本移动的一般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 (MacDougall) 于 1960 年建立的, 又称为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用以分析国际资本移动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利益。其后, 又由肯普等人将该模型发展成分析借贷资本国际运动中双方当事国利益分配的一般工具。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分配模型如图 1-1 所示。假设有甲、乙两国, 甲为资本充裕国, 乙为资本短缺国。甲国拥有资本量 MA 乙国拥有资本量 NA 。根据边际产出递减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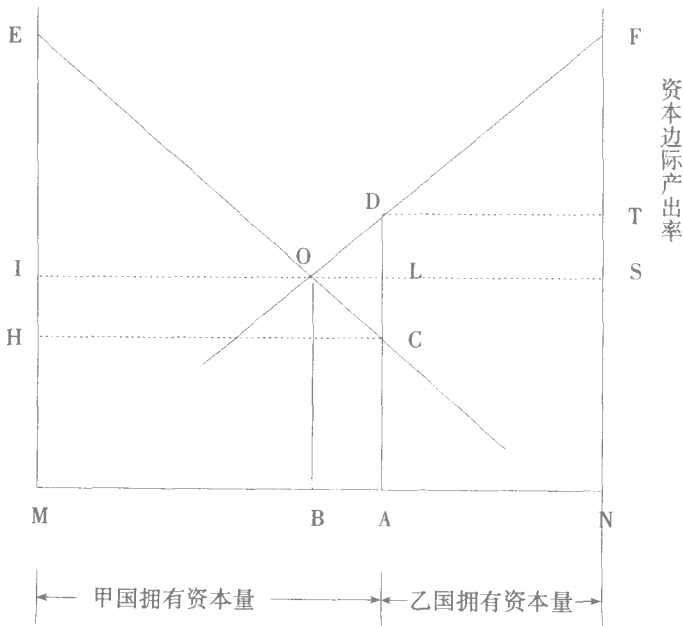


图 1-1 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律，在其他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每一追加资本的单位产出率递减。假定两国内均存在完全竞争，资本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图中 EO 表示甲国的边际产出曲线， FO 表示乙国的边际产出曲线。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两国间不发生资本移动，甲国将全部资本 MA 投入国内生产，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为 MH ，这时国家总产出为 $MECA$ 。其中矩形 $MHCA$ 部分为资本收益，三角形 HEC 部分为其他生产要素带来的收益。同样，乙国也将全部资本 NA 投入国内生产，资本的边际产出率 NT ，国内总产出为 $NFDA$ ，其中矩形 $NTDA$ 部分为资本收益，三角形 TFD 部分为其他生产要素带来的收益。显然，在两国间不发生资本转移的条件下，资本充裕的甲国其资本边际产出率从而资本收益率低于资本短缺的乙国，即 $MH < NT$ 。

当允许资本在两国间自由移动时，由于乙国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甲国，于是资本充裕的甲国的部分资本跨越国界向乙国移动。假定有 AB 量的资本从甲国输入乙国，从而使两国的资本收益水平在 O 点达到均衡， $MI = NS$ 。此时，乙国由于甲国资本的流入而使其他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总产出由 $NFDA$ 增至 $NFOB$ 。其中 $NSOB$ 部分为资本收益， SFO 为其他生产要素带来的收益。在资本收益 $NSOB$ 中，矩形 $ALOB$ 部分为资本 AB 的收益，用于支付外国资本的报酬，乙国在新增的产出中实际获得新增的其他生产要素收益就是 LDO ，即引进外资的净收益。同时，甲国由于资本 AB 的输出，国内总产出由 $MECA$ 降至 $MEOB$ ，但甲国可以从对乙国的投资 AB 中获得资本收益 $ALOB$ ，这样一来，甲国的总收益反而增加了 LCO 。可见，由于资本的跨国移动，两国都各自获得了新增的收益。从总体上看，对比封闭经济，总产出也由于资本合理配置而增加，增加量为两国新增收益的总和，即 CDO 。

通过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的跨国界移动首先对甲乙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从甲国来

看，由于输出资本，一方面增加外汇的流出，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甲国由于在国外的投资而获得增大的资本收入，假定国外资本利润都以外汇汇回，则使甲国的国际收支处于有利状况。从乙国来看，由于引进外资而使本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也由于外资的进入而增加了外汇流入。但乙国在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实际获得的收入比外国资本的收入要低，而外国资本的不断汇出，又将长期影响乙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其次，资本的跨国界移动还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从甲国看，由于输出富余资本而使国内资本收益率提高，从而使国内资本的实际收入增加，加上国外投资的收入，甲国资本总收入显著增加；同时，由于国内资本投入相对减少而导致劳动和其他要素利用不足，竞争加剧，价格相对降低，从而使它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下降。从乙国来看，由于外来资本的输入降低了国内资本收益率，国内原有资本的实际收入也相应降低；但由于国内劳动、土地和其他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其收入明显增加，其中既包括了因资本收益率降低而从原资本收入中转移过来的国民收入，又包括因外资投入使过去闲置的其他要素获得充分利用的净增收入。这种由于资本跨国移动引起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只影响到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关系，对国家利益（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收支状况）无直接影响。但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分配关系的变化常常会引发社会矛盾，进而危及国家利益，因此这种影响也构成资本移动双方国家要考虑的社会成本因素。

国际利益分配模型表明，资本的跨国移动会增加资本输出和输入双方的国家利益，世界的总财富也因此而增加。因此，尽管这种移动会使有关国家付出一定代价，国际投资仍广泛地发生。该模型的贡献在于用简明的数学语言阐释了资本移动给双方当事国带来的利益，揭示了国际投资普遍发生的一般动因。战后的一段

时期内，该模型被用来解释货币化资本的运动，但该模型也有较明显的局限性。

该模型为了理论分析的清晰而作了抽象的假定，即世界经济是由两个国家组成，资本只从资本绝对充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绝对短缺的国家，在这些假定下一般性地研究国际资本移动。但现实中的世界不仅由许多国家组成，资本拥有量的多寡和收益率的高低也很难绝对地确定，因而资本的运动可以有多个方向。

例如，由于资本收益率存在多种差异并且是动态变化的，而决定资本转移的条件不仅仅是收益率一个因素，这就有可能出现 A 国向 B 国投资，B 国又向 C 国投资的情况。作为 B 国既有资本流入又有资本流出。如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又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另外，由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资本拥有量相近的国家可能互相进行投资。这些都是资本在同一个国家发生双向运动。战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货币化资本结合技术等无形要素的相互转移就是证明。在发生资本双向运动的国家，其利益驱动机制仍可以用该模型来说明。当其输入外国资本时，它会因国内充裕的其他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而获得国内产出及收入增加的利益；当其输出本国资本时，它又获得了转移国内资本和技术到国外更好的收益环境中使用的净增利益，从而获得双重利益。

1.2

国际资本移动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 R. M. Solow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建立的，该模型是研究封闭条件下一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其一般公式为：

$$g = S/R$$

式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S 表示储蓄率， R 表示资本产出率或单位产出所需资本量。该模型假定，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技术水平基础上，资本产出率是大体不变的常量，因此，经济增长率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即取决于封闭条件下国内资本的供给。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假定条件是资本的产出率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变的，并且劳动力的增长总是能够适应资本增长的需要，而无须考虑要素价格变动和要素替代问题。这些假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针对该模型的缺陷，罗伯特·索洛进行了改进，在其基础上发展起用于说明开放条件下国际投资与一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模型。然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仍存在局限性，他没有考虑一国向国外借款时可能发生的影响。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逊教授(John. Williamson)又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扩展性分析。

威廉逊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移动对有关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积极作用的。国际投资的一般动因是为了在短期内增加收入，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吸收外资方，都希望通过资本转移而获得利益，这一认识与前述国际资本移动的一般模型是一致的。不过他认为，国际资本移动还存在另一个动因，这就是有关国家为改变实际资源总量吸收时程而借款或贷款

如图 1—2 所示， A 表示一国经济中实际吸收的资源总量；实曲线 $Y = GDP$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虚曲线表示国民生产总值 GNP ，反映收入。假设国内投资时程给定，从而收入的时程不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图 1—2(a) 所示，该类国家目前享有较高水平的国内总收入，但它没有把全部收入都用于即期消费，而是将部分收入投资于国外。在此，国内投资不变，推迟消费与推迟吸收有同等涵义。这种情况使它在此后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时，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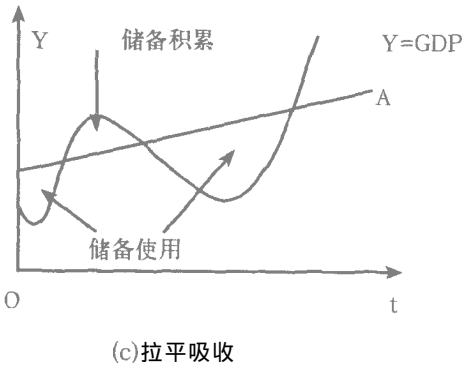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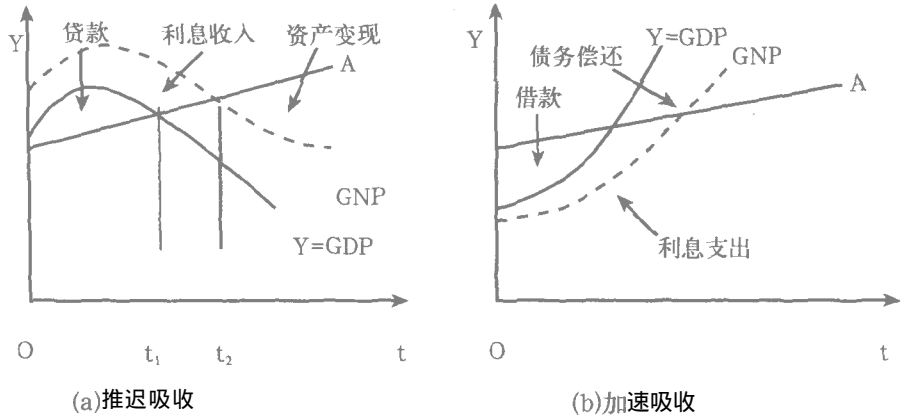


图 1—2 改变吸收时程的国际资本流动

靠国外投资的利息收入来满足国内资源吸收的要求。

如图所示 在 t_1 时刻之后, 吸收开始超过国内收入, 所需差额由过去对外投资的利息收入来弥补, 而在 t_2 时刻后, 利息收入已不足以弥补吸收的缺口, 它将开始把国外资产变现以满足国内经

济增长的要求。这类国家为推迟吸收而对外进行投资或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战略储备作用。

第二种情况则相反 如图 1—2(b) 所示，这类国家为了近期的经济增长而加速吸收，国内总产出不足以满足这种吸收的要求，必须从世界资本市场借款来解决。由于要支付借款利息和清偿债务，这种加速吸收的借款实际上意味着把经济增长的未来收入提前支取在即期使用。

图 1—2(c) 则表示了第三种情况，这一类国家的收入不稳定，变化波动较大，通过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来拉平国内经济资源吸收。当国内收入较高时，对外投资或贷款，以积累一定储备；当国内收入较低时，用在外国储备的资产予以弥补，从而使国内吸收（或称为资源吸收）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而避免吸收随同收入一起波动。

威廉逊的上述分析比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增加即期收入为动因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从动态角度指出各国为长期增长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他所分析的为改变吸收时程而借款或贷款的三种情况，对制定国家的投资政策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1.3

两缺口理论的缺憾

前述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就封闭经济作了均衡分析，强调国内储蓄对资本积累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一国资本积累除了国内储蓄的供给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钱纳里（H.Chenery）和以色列经济学家迈克尔·布鲁诺认为，可供投资使用的进口资本货物影响着—国的资本积累，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缺乏投资刺激，而是缺乏投资的资源。因此，储蓄

缺口和外汇缺口是制约这类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汇流入对弥补这两个缺口都具有重要作用。

两缺口理论主要涉及了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指出约束这类国家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资金短缺，更主要的是外汇资金的短缺，因为这些国家必须进口增长所需的资本品和技术。这一理论有助于说明发展中国家为达到最大增长率可能遇到的主要政策问题，但其所指明的政策方向却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按照这种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受到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双重限制，因此引进和利用外资，即利用外国储蓄来填补国内储蓄就成为促进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储蓄和对外出口水平较低，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只能处于受资国的地位，无力也无须发展对外投资以分享国际经济利益，国际投资的流向只能由储蓄和外汇丰裕的富国流向这两者都缺乏的国家。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尽管这类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确实需要提高资本流入，以减轻国际收支压力，但随着经济迅速增长，扩大出口的要求将会超过进口的需求。扩大出口才是发展中国家弥补外汇缺口的积极手段。在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捕捉市场信息，改善生产结构，进而带动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弥补资金缺口，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正是按照这种认识，走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两缺口理论的结论。另外，两缺口理论所分析的是货币化的资本流动，并没有考虑同生产与技术结构密切相关的直接投资，这也是其缺憾之处。

1.4

国际投资周期规律分析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H.Dunning)对自己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了动态的发展,提出了国际投资周期论。

邓宁曾长期从事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一系列论文中综合地概括了当时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肯定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跨国公司谋求实现优势的动因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动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三个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邓宁在自己所著的《国际生产与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移动》两部书中,依据折衷主义三优势理论,对国际投资在不同国家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际投资周期论。邓宁研究了67个国家在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见表1—1),明确提出国际投资的运动同特定国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据此邓宁将这些国家分成四组。第一组为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25个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少的外资进入,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几乎完全没有。第二组是处于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在增长,并已开始有对外投资流出,但投资净流出为负值。第三组为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的国家,净投资流出仍为负值,但数值在变小,这表明该组国家直接投资流出的上升速度快于投资流入。第四组为处在人均GNP2600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投资净流出为正值,表明资本流入小于资本流出,这些国家是

表 1—1 1967—1978 年人均直接投资流量和 1971 年人均 GNP

人均 GNP (1971)	加权平均 1967 ~ 1978			非加权平均 1967 ~ 1978			
	流出	流入	净流出	流出	流入	净流出	
						1967 ~ 1975	1976 ~ 1978
4000 美元以上	33.0	16.3	16.7	24.8	30.3	-5.5	7.9
2500 ~ 3999 美元	20.2	15.7	4.3	20.8	31.4	-5.5	-7.6
1000 ~ 2499 美元	3.2	12.9	-9.7	1.2	39.6	-10.6	-32.6
500 ~ 999 美元	0.4	8.6	-8.2	0.4	21.8	-37.4	-14.4
400 ~ 499 美元	0.2	7.4	-7.2	0.2	9.0	-21.4	-7.1
300 ~ 399 美元	0.2	3.2	-3.0	0.1	3.7	-8.8	-3.2
125 ~ 299 美元	0	3.1	-3.1	0	1.9	-3.6	-2.9
125 美元以下	0	0.5	-0.5	0	1.3	-1.9	-1.6

国际资本的主要输出国。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直接投资具有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而对外净直接投资呈现出比较规律的变化，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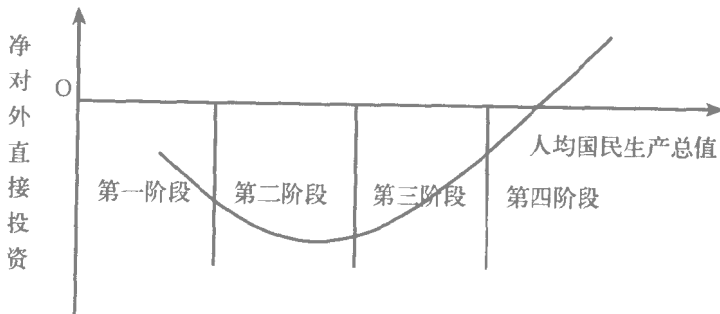


图 1—3 净对外直接投资规律

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性变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年人均 GNP 在 400 美元以下，这些国家几乎没有直接投资流出，也很少接受直接投资，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较小的负数。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也没有内部化优势，因而没有对外投资的条件。同时，由于国内缺乏令投资国满意的区位优势，如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外资流入也很少。第二阶段年人均 GNP 在 400 ~ 1500 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接受直接投资处于上升阶段，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对外净直接投资为负，且负数值在增大，意味着吸收投资大于对外投资。这说明由于实施进口替代 市场扩大 投资环境改善 区位优势增加 直接投资流入也开始增长。但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增长有限，难以克服国际化生产障碍，所以直接投资流出仍然很少，且集中于邻近国家。第三阶段年人均 GNP 在 2000 ~ 4750 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对外净直接投资虽也为负值，但其绝对额在不断减少，这是由于接受外资减少，或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快于接受外资的速度。在此阶段，该国一些企业所有权特定优势增强，原来的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子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下降，该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上升。第四阶段年人均 GNP 在 2600 ~ 5600 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对外净直接投资为正值，并呈增长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比接受的直接投资增长得更快。这表明该国企业具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也善于发现取得国外的区位优势。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在获得该国的区位优势 and 发挥自身所有权优势方面受到更大的挑战。

国际投资周期理论从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出发进行宏观分析，对国际投资动因作出新的理论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但用人均 GNP 这个单一的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并据此判断一国对外投资动力的大小是缺乏全面性的。现代国际投资实践也显示出与该理论相悖的

事实。此外，对于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的交叉，邓宁本人也承认在年人均 GNP 较高水平上，该指标不能充分说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地位。

1.5

劳动的国际分工理论及两种投资模式比较

20 世纪 70 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 Kiyoshi Kojima 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投资结合起来，以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成本为基础，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试图建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统一理论。小岛清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劳动的国际分工理论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理论。

小岛清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可以解释不同规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消费偏好的国家，在生产要素不能移动的情况下，通过生产自己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交换产品。这样在既定的劳动资源下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此，只要存在相对成本差异，并有合适的汇率，国际贸易对参加贸易的双方都有利益。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各国之间相对成本的差异取决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别。这样，劳动的国际分工原则应该是：每个国家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这种产品更多地使用该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较少使用该国相对缺乏的生产要素。按照这个规律，劳动比较缺乏而资本比较充裕的发达国家，应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资本比较缺乏而劳动比较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则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虽然通过自由贸易可以给参加贸易的国家都带来益处，但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在国际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是十分有限的。

小岛清指出，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国际上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取得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他称之为边际产业）中，投向东道国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因此，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边际产业为序依次进行。小岛清称这一国际分工的原则为“补充比较优势原则”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于边际产业原则”。从宏观角度看，这种类型的投资将为东道国提供其缺乏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当地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员的成长，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对投资国来说，将在本国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能保持优势的部门，使投资国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同时，通过这种投资，投资国会为东道国的产品提供市场，东道国通过出口会增加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从而为投资国较高层次的产品出口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这种投资不仅不会替代贸易，相反会促进贸易更加和谐地发展，使投资国与东道国都能从按比较优势建立的国际分工中得到贸易的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日本式和美国式两种模式。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日本海外投资中资源开发型占相当比重，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则是贸易导向型。日本对外投资中大量投向发展中国家，开发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农业和适合其国情的制造业，以确保对日本经济至关重要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因为日本缺乏自然资源，这种生产在日本处于比较劣势。日本在海外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大多选择在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而转移到东道国却能够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纺织、服装、汽车装配部件、电子元件等。这些产品在海外生产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增加日本企业最终产品如工厂机器设备和技术诀窍的出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而且对日本的比较优势地位起到了补充作用。

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却是非贸易导向型的。美国对外直接投

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往往把竞争力很强的产业向国外转移，这些在美国本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国外生产后，行业本身优势被切断。随着生产技术的标准化，制造知识的传播，美国生产者的经济规模达到极限，该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布局就会逐渐以工资成本和要素禀赋确定。美国最终要从其投资的东道国进口这些产品，使本可以通过出口而增加的贸易顺差丧失，引起国际收支失衡，贸易条件恶化。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破坏贸易的作用，阻碍美国产业结构的改善，不仅传统产业在激烈竞争中处于停滞，在新产业上也使美国的比较优势削弱。

1.6

国际资本移动宏观理论辨析与启迪

(1) 肯定与质疑

上面阐述的主要的国际资本移动宏观理论，都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国际投资发生原因及决定因素。这些理论各自立论的基础和分析方法不尽相同。

国际资本移动的一般模型是借鉴凯恩斯的投资函数方程及图式所建立的，该模型用简明的数学语言阐述了资本移动给双方当事国带来的利益，揭示了国际投资发生的一般动因。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该模型被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现象。但是，该模型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首先，该模型简单地假定世界经济中的资本移动只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而且资本只从绝对富裕的国家流向绝对短缺的国家，这与现实中资本国际运动的多样化方向是不相符的。现实中一个国家往往既有资本流入，又有资本输出，处于双向运动的地位，而且资本拥有量相近的国家之间也在相互进行投资。其次，该模型只是一般性地研究国际资本的移动并未涉及技术、管理、营销技巧等的转移而这些往往是伴随资

本移动而发生的。

早在麦克杜格尔建立国际资本移动一般模型之前，哈罗德—多马在 40 年代后期就已针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短期和静态分析，提出并建立了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用以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内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该模型假定资本产出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技术水平基础上是大体不变的常量，这与现实经济生活是相悖的。威廉逊对该模型进行改进，在其基础上分析开放条件下国际投资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他认为，国际投资除了在短期内增加收入这一动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即改变实际资源总量吸收时程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威廉逊的分析对一些存在周期波动的发展中大国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然而，威廉逊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运用对外投资来调节国内收入的波动，他只是强调初期产品出口国家由于气候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导致的收入波动，因此他所说的储备积累与使用的拉平主要是就国际收支平衡而采用的，他仍然认为决定一国对外投资或吸收外资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发达程度和国内储蓄的高低状况。这是威廉逊模型的缺憾之处。

两缺口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仅是国内储蓄的高低状况，还有可供投资使用的进口资本货物。因此，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尤其是外汇短缺，使这类国家在进口增长所需的资本品和技术时遇到困难。按照这一理论，国际投资的流向只能从储蓄和外汇充裕的国家流向这两者都缺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转移过程中只能处于受资国的地位，无力也无须发展对外投资以分享国际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显然无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能力，与现实中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活动的实际也是不相符的。

国际投资周期理论是邓宁对自己的国际生产折衷主义三优势